

書評

閱讀《翻譯與文學之間》

余淑慧

書名：翻譯與文學之間

作者：王宏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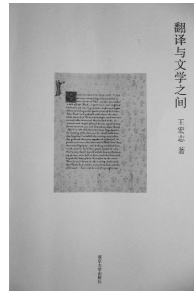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：南京大學出版社

出版年：2010

總頁數：374

ISBN：978-7-305-07986-3

售價：人民幣 39.80 元



《翻譯與文學之間》是王宏志教授繼《重釋信達雅：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》(1999)之後，新近出版的翻譯研究論文集。本書收入論文九篇，若稍作區分，似可分為兩大部份，一是文學翻譯相關的討論，如晚清對翻譯小說的接受、卞之琳的棄文從譯、周作人的譯事考掘。二是一般翻譯相關議題的研討，如譯者研究、贊助人研究、早期外語教育與譯員培訓等。以下略為評介之。

首先看一般翻譯議題之討論。

〈「叛逆」的譯者：中國翻譯史上所見統治者對翻譯的焦慮〉是廣義的譯者研究，透過整理清中葉官方檔案（奏摺），作者討論十八、九世紀中國譯者／通事如何因歷史、體制與統治者因素而被視為政治上的「逆者」。由於統治者的焦慮，某種「夷夏之辨」的思想，譯者在清廷的文書裡，通常就等於「漢奸」（頁2）。

最具諷刺或令天下譯者備感辛酸的是：通事本是清政府的一員，一旦有事，反而被自己人背叛，成為官吏用來制夷的人質。究竟誰背叛了誰，這是一個很難一語道盡的問題。

〈權力與翻譯：晚清翻譯活動贊助人的考察〉援引勒菲弗爾的贊助人論述，從官方與私人兩個角度討論晚清譯事的複雜。官方方面，作者檢視了林則徐，恭親王奕訢各自組成的翻譯團體，私人翻譯則討論了吳汝綸對嚴復的幫助與影響。有趣的是，林則徐作為晚清翻譯活動的第一位贊助人，為了順利推展夷務，他固然有權力指揮譯者翻譯他要的資訊，然而其權力始終受到自身「官運」與華夷之辨的牽制（頁 50-55）。奕訢奏請成立京師同文館成功，但他也不時遭受保守派撻伐，招生與延聘師資都波瀾頻起。准此，真正掌權的似乎在林、奕之上另有其人：一是道光，一是慈禧；而在此二人之上者，更有大中國中心的傳統思想——夷夏之辨——的左右。設若推此三者為此時翻譯活動的「贊助人」，似乎也並無不可。吳汝綸除了在詩學方面導引嚴復，為其潤文寫序外，據學者研究，他更關心的可能還有文章道統能否保持純正，西方思想是否會反客為主，搶奪中國固有的地盤。嚴復以純正典雅的古文包裝西方思想，對此，吳汝綸的心態是很複雜的。作為嚴復的贊助人，他的擔心與操控似乎尚有許多複雜的層面可資探討。

〈京師同文館與晚清翻譯〉的篇幅很長，資料十分豐富。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外語學校，旨在訓練外語、外交人才。如作者所言，同文館之成立代表了某些有識之士願意放下華夷之別，以夷為師，但落實到延聘教習、招募學生、課程設計等實務面，讀者還是看到清政府的「願意」，其實仍停留在理論層面。八旗子弟不屑學外語；洋教習必須時刻加以「監察」；本是外語學習，最後重點卻落在「諸學」（頁 111-118）；運作 40 年，譯得的西書不過 26 種（頁 126）或 25 種（頁 141）。雖然這樣，同文館在近代中國外語教育與翻譯史所扮演的承先啟後角色，畢竟地位不可抹殺。

〈文言與白話：晚清以來的翻譯語言的考察〉探討晚清到 20 世紀 30 年代之間翻譯語言的急遽轉變。透過史料分析，作者指出翻譯語言之選擇亦「涉及社會，政治，文化」等面向（頁 228），而這當中的關鍵是「擬想讀者」的制約。戊戌政變之後，翻譯的語言是白話，因為當時的擬想讀者是普通群眾。然而始料未及的是，其時真正的讀者卻還是傳統讀書人；基於文人的美學要求，最後還是文言文取勝。到了五四時代，白話文成為主要書面語。但反對白話文的聲音也時有所聞。與此同時，亦有學者提出以歐化語體來解決白話文過於簡單的缺點；他們認為藉此方式，可以引進新的表達方法和語詞，改革中國語文，例如魯迅後來就採用逐字對譯的方式，並視之為正確的翻譯方法。此所以魯迅的翻譯語言與創作語言有別。行文至此，筆者有個雖然有點題外但始終無解的疑問：若翻譯引進的字法句法可以改善本國語文，創作者（例如魯迅）何以不用，寧可使用舊有的語言創作？

如何「正確」翻譯，這在清末民初是個重要議題。本書第七、八章以魯迅、梁實秋、瞿秋白為中心，討論魯迅的直譯，梁實秋的意譯，以及三人之間這幾場論爭背後的政治議題。有趣的是，作者指出魯、梁雖然筆戰激烈，兩人的翻譯標準其實很是相近。這兩章曾收入《重釋信達雅》（王宏志，頁 218-239；頁 240-272），這裡不再贅述。

接下來看翻譯與文學相關的篇章。

〈「以中化西」及「以西化中」：從翻譯看晚清對西洋小說的接受〉檢視了晚清讀者對西洋小說的理解。晚清的文學翻譯是很功利的，翻譯只是為了借用原文的權威，「推動一些本國文學自身所不能產生的改變」（頁 149）。這是「以西化中」。一旦所譯的作品與本國人情、倫理、品味不合，譯／論者就搬出中國固有的標準，對原著的內容、形式任意增刪修改。這是「以中化西」。基本上，晚清的文學翻譯始終搖擺在這兩個標準之間，既渴望藉助翻譯之力來改革本國文學，又對譯本的異質性百般提防，可謂矛盾至極。換言之，晚清時人對西洋小說的理解是失焦的；

何者為創作，何者為翻譯，其間的界限十分模糊。

若晚清文學譯者有時混淆翻譯與創作，那麼〈「畢竟是文章誤我，我誤文章」：論卞之琳的創作、翻譯和政治〉所論，就是一位拋棄創作，轉向翻譯的詩人卞之琳。在三，四〇年代，卞除了寫詩，也譯介了許多西方現代派詩作，到了五十年代才轉向譯介與研究莎劇。論文綜合卞的創作、翻譯和文學評論，放入四九年後的政治與文化空間，檢討卞如何在四九年後調整創作方向，轉而寫起寫實的政治詩，繼而又轉向翻譯兼莎劇評論。透過如此的檢視，作者讓我們看到翻譯、文學、政治這三者在特定時空中呈現的微妙牽制。

〈「人的文學」之「哀弦篇」：論周作人與《域外小說集》〉是一篇翻案文章。這篇文章立論嚴謹，外證內證層層進逼，論述推展極具說服力，讀來十分精彩。《域外小說集》（以下簡稱《域》）出版於1909年，1921年重印，至今已將近百年。然而《域》至今多半與魯迅聯繫在一起，極少有人知道該書與周作人（以下簡稱周）的關係。作者在這篇論文裡廣泛運用各種研究與第一手資料，就翻譯過程、分工模式、選材、方法、文學品味幾個面向，帶領讀者回到小說出版的歷史語境，除了檢討過去關於《域》的論述問題，也確立周氏兄弟，尤其周在中國近代譯史的位置和貢獻。

文章一開始，作者即嘗試破解《域》曾經影響近代文學翻譯的神話，點出《域》曾經影響五四文學翻譯方向的說法乃是一種「虛構」（頁230），理由是當時的文獻資料不見有人提及這部譯著，也無人提到該譯本對他／她的影響或啟示；更別提該書銷路極差，出版半年內僅賣出40本；更重要的是作者套句魯迅自己的話：此書「以後便再沒有人買了」，此言可謂強而有力地消解了上述的影響神話。

破解神話畢竟只是本篇論文的序曲，更重要的是王教授還原歷史現場，找出《域》譯製的真相。論文首先從外證入手，例如從譯作的分工點出《域》不僅不能算是魯迅的作品，主要譯者也不是魯迅。《域》之選

譯東、北歐與俄國作家的作品，其實是周數十年一貫的堅持。而最有力的真相說明是：1921年重印時，魯迅把署名由1909年的「會稽周氏兄弟」改為「周作人編譯」，可見魯迅自己並不想居功（頁242）。

論文的後半則從內證入手。作者直接細讀《域》的小說與譯介，搭配周寫於這段時期的日記、回憶錄與作品，點出《域》選譯的文類與風格比較接近周的文學品味。例如周不喜結構，喜歡那些「不大像小說的隨筆風的小說」（頁245），而《域》選譯的小說都內容不顯，近乎晦澀，「幾乎沒有故事情節」（頁246），這與魯迅重視小說情節與結構的作風形成明顯的對照。《域》選譯的作家多半來自被壓迫的弱小民族，因而經常被解讀成吶喊的革命文學。透過細讀，作者點出《域》並無吶喊反抗的聲音，有的反而是陰鬱的悲哀、逃避與「非戰」的思想（頁250）。再者，《域》的譯介文字也看不到勇敢的革命鬥士，即使該原文作家本是革命份子，例如顯克微支，但《域》對他的介紹卻側重於文字與技巧的精湛。《域》作為革命文學，其虛構性至此不攻自破。

論文最後檢視了周寫於1908年的〈哀弦篇〉，因為這篇文章與《域》的翻譯時間同時，最能反映周這時期的思想。此文約一萬多字，介紹東、南歐、希伯萊文學，主旨為「衰世哀音」（頁263）。作者比較其構想與內容，發現與《域》原來的翻譯計畫是一致的；換言之，〈哀〉與《域》本來就是周打算用來譯／介外國文學的兩種媒介：論文＋翻譯小說。再者，〈哀〉（揭示）的文學思想是文學之能夠移情，惟哀弦而已；由此再回頭看《域》，作者發現《域》每一篇譯文幾乎都符合周這一小說美學。至此，《域》與周的關係可謂確鑿無疑，而周作人在翻譯文學史上的地位亦當然由此確立。